

当代年轻人的逃离

——基于《逃避统治的艺术》视角

贺鑫龙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000; 1581832641@qq.com)

摘要:当代年轻人逃离一线大城市、转向鹤岗等小城市的现象,与詹姆斯·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中提出的“无国家空间”理论具有内在关联。研究将斯科特的理论引入当代社会分析,为理解青年群体的生存策略提供了跨时空的学术视角,通过对比东南亚山地居民逃避国家统治的策略与当代年轻人的选择,揭示二者在反抗规训化生存逻辑上的相似性。

关键词:逃避统治;大城市逃离;鹤岗;年轻人;低欲望社会

引言

斯科特在多部著作中,始终将国家作为批判对象。他认为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古典国家,主要目标都是对社会进行管制并扩大权力范围。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他把政府描述为勒索者,指出殖民统治在乡村通过牺牲村民利益确保自身收益[1]。在《逃避统治的艺术》里,谷地被视为征用空间,国家依赖税收和租金,与人民处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逃避的根本原因。与传统观念中认为山地居民落后、等待文明发展的观点不同,斯科特指出他们所表现出的落后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东南亚山区的居民通过选择远离国家中心的地理位置和松散的社会结构,逃避国家的直接统治和规训。斯科特通过对东南亚高地“赞米亚”地区的分析,挑战了传统国家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提出了一套关于“无国家空间”的原创理论。

1 斯科特的“无国家空间”理论

斯科特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全球谷地国家的形成以及人们逃离谷地向山地迁移的过程,赞米亚地区是涵盖东南亚和中国西南部的广袤山地的崎岖地形,山脉、丛林、河谷不仅是自然屏障,更是山地居民主动选择的场所。斯科特强调,地理环境本身是“政治工程”——山地居民通过迁移至难以被国家机器进行税收、征兵、行政系统渗透的区域,主动创造“边缘性”。历史上,许多山地群体如克伦族、苗族人的祖先原居于低地平原,因逃避战争、税赋或奴役而迁入山地。地理屏障成为他们抵御国家权力扩张的“人工堡垒”。例如,利奇在《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指出缅甸平原的农民在18世纪为躲避贡萨王朝的强制劳役,大规模逃入掸邦高原,利用地形切断与国家的联系。崎岖地形不仅阻碍军事征服,更使国家无法建立道路、驿站等稳定的行政基础设施。山地地形的分散性和交通困难性,极大削弱了国家的行政效率和经济收益,使统治成本远高于预期收益,地理条件决定了山地无法成为国家的空间。缅甸王朝曾尝试在克钦山区修建税站,但因维护成本过高而放弃。斯科特指出,这种“不可统治性”是山地居民与地理环境协同作用的产物——他们通过选择定居点、破坏道路、隐匿路径,进一步强化地形的政治防御功能。

斯科特将“低地社会”(国家)与“山地社会”(“无国家”空间)截然两分、彼此对立,视二者之间为“刺激—反应”关系[2]。对于生活在谷地中的谷民来说,山地人是他们眼中的异族,被视作落后的、野蛮的,甚至是文明程度最低的种族。这群人被蔑称为“番”、“蛮”,他们的存在似乎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

彼此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然而所谓的文明程度，实际上是指一个人的适应能力和融入程度——是否能够将自己与国家融为一体，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历史上的“生”、“熟”之别，不过是一种简化的划分方式，用以区分那些被国家文化所同化，或未能完全融合入主流社会的山地人。山地人季节性迁徙、跨界迁徙等流动，进一步瓦解了国家对其人口与领地的稳定控制，形成“主权不能全面覆盖的缺口”。斯科特一反过去认为轮耕是“原始落后”的观点，认为轮耕的本质是为了避免国家的剥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轮耕要求的流动性以及土地的非私有化性质，使得国家很难以固定地籍征税或征收劳力。在“去国家化”的生计模式下，高地人混合了采集、打猎、刀耕火种以及小规模的交易方式，以较少地依赖于一种农作物。这一经济模式降低了国家对食品供应的控制所带来的风险。谷地国家建立在诸如稻米之类的集约农业之上，这是山地居民刻意回避的，因为前者要求固定的土地，集中的劳动力，以及剩余产品的积累，而这恰恰是政府征税和征募士兵的前提条件。

斯科特在山地社会中将分散的血缘网络，轮流的领导权以及集体决策机制，视为避免形成稳定的层级结构的决策。山地社会以扩展亲属制度为基础，取代垂直官僚体系。例如，克钦族的“姆尤-达玛”婚姻联盟制度，通过跨家族的姻亲关系形成横向权力网络，避免单一家族垄断资源或权威。这种结构天然排斥国家所需的“可识别代理人”。斯科特指出，山地社群的“头人”或“长老”并非固定职位，而是基于具体事务临时推举，事毕即解除权力。军事领袖仅在战时拥有指挥权，和平时期回归普通成员身份。这种流动性权威使国家无法通过收买或消灭领袖实现控制。山地社会通过夸富宴、礼物交换和集体狩猎，强制财富再分配，猎获大型动物必须全村共享。此类实践抑制了财富积累，避免出现足以挑战集体权威的经济精英。这样的社会结构降低了权力集中的可能性，使得国家难以“分而治之”的方式来实现对国家的控制。山地社区缺乏长期的中央权威，决策权力分散在家庭或村落单元。适于逃离的社会结构是以分散、平等为特征的国家空间的层级结构，它倾向于避免形成大的社会组织或集团，而形成小集团，这些小集团能够快速分散流动。斯科特把这一社会结构形象地比喻成了一只水母，它们彼此间的关系很松散，没有固定的结构，这样就方便了它们的行动，也很难管理。这些小单位就像砌墙的砖块一样，既可分散又可结合。与此相适应的是，他们重视平等，避免了等级制度的产生。“去中心化”的反等级制度和“无政府秩序”削弱了国家通过购买或铲除地方领导人来实现间接统治的可能性。山地族群成员身份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他们通过联姻、收养、结盟等方式不断重构社会关系，形成了一种动态“社会弹性”，以应对国家和资源的压力。

山地居民由口头传统、神话与记忆来逃避文本体系所定义的固定身份与空间，保持文化的流动与无形。山地居民往往采取多种民族身份，甚至积极地“野蛮化”，以此构筑被低地国家视为“未开化”的文明标签，因而拒绝被纳入国家文明化计划之中。在近代之前，文字并不是大众传播的工具，而是掌握在少数知识分子手中，用来论证国家统治的正当性。人们常把文字作为进化的标志，认为有书写的群体比无书写的群体具有更高的文明水平。国家通过文字档案、法典和官僚体系实现治理术的标准化，而山地社会则依赖口传史诗、歌谣与神话构建流动的集体记忆。这种“弱者的文本性”打破了“印刷资本主义”构建民族认同的垄断路径，形成了以声音、仪式和身体实践为载体的另类知识传播网络。不过，按照斯科特的说法，那些逃到山里的人，在平原上生活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文字的，只是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字，这也是为了避免国家用来进行统治的逃避艺术。山地人逃离时，不再需要知识精英或文字作为其统治合法性的凭证，而是以更具流动性、可随时再创造的口头文化来代替文字。口头文化取代文字，极大地便利了山地族群不断建构新的族群认同。当低地国家用佛教或伊斯兰教等普世性宗教建构“文明开化”的等级秩序时，山地族群通过万物有灵信仰体系解构中心化的神圣权威。巫师以碎片化的自然神灵沟通抵抗佛教僧侣的等级化宇宙观。这种“去中心化的神圣性”不仅颠覆了韦伯式宗教理性化叙事，更通过将权威分散到山川、图腾与日常器物中，使国家无法垄断象征资本的生产，其仪式与宇宙论更多地强调与自然环境的直接互动，而不是依靠中心化的宗教权威，从而进一步消解国家对其意识形态的渗透。

经济、社会和文化构成了一个整体，形成了一个逃避统治的空间。“如果说游耕和散居是为了阻止被征用的生存策略；如果说社会碎片化和没有首领是为了阻止被国家统合；那么同样，没有文字和文本也使他们可以自由地操纵历史、谱系和清晰性，从而挫败国家贯彻其制度[3]”。

2 大城市的高度规训化与年轻人的选择

2.1 经济规训：高房价与高生活成本

一线大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高房价不仅限制了他们的居住选择，还迫使他们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高强度的工作中，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这种经济规训使得年轻人难以实现个人自由和发展。相反，鹤岗等小城市的生活成本远低于一线大城市，年轻人在这里可以以较低的经济压力获得相对舒适的生活。这种低压力生活使得他们能够摆脱大城市的规训，追求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

2.2 社会规训：竞争与内卷

大城市的社会结构高度竞争化，年轻人被迫参与到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教育、就业、婚姻等方面的内卷现象使得年轻人感到疲惫和无力。这种社会规训不仅剥夺了他们的生活乐趣，还使他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相反，小城市的社会结构相对松散，竞争压力较小。年轻人在这里可以摆脱大城市的激烈竞争，享受更加宽松和自由的社会环境。这种低竞争环境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

2.3 文化规训：消费主义与标准化生活

大城市的消费主义文化使得年轻人陷入物质追求的泥潭。标准化的工作、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单调和乏味。这种文化规训使得年轻人难以找到真正的自我和生活的意义。相反，在小城市年轻人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自由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他们不再受到大城市标准化生活的束缚，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和个性化生活。

3 逃离大城市与“逃避统治”的内在联系

年轻人选择逃离大城市，本质上是对高度规训化生活的反抗。通过倡导对过度欲望、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主张一种更为理性化的可持续生存方式[4]。他们通过选择低压力、低竞争的小城市生活，摆脱了大城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规训，追求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逃离大城市的行为体现了年轻人对自由和低压力生活的追求。他们不再愿意被大城市的规训所束缚，而是选择了一种更加自主和轻松的生活方式。年轻人逃离大城市的行为也反映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反思与批判。他们通过选择小城市生活，表达了对现代社会高度规训化、竞争化和标准化生活方式的质疑和不满。

4 结论

斯科特挑战了将国家视为历史必然的“文明终点”的叙事，指出国家只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可能形态。他揭露所谓“文明化使命”实质是高地国家为扩张统治合法性而构建的意识形态话语。高地居民并非被动受害者，而是通过集体行动和策略性选择如迁徙、文化调整、技术回避主动塑造“无国家空间”。这种能动性颠覆了传统史学中边缘群体“被历史遗忘”的刻板印象。赞米亚作为“反历史”地区，斯科特将赞米亚视为一个动态的“逃离国家”的连续过程，而非静态的地理实体。他通过这一案例揭示，边缘地区的“非国家化”与国家的形成实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两面。

当代年轻人逃离大城市前往鹤岗等小城市的行为，与詹姆斯·斯科特所描述的“逃避统治”行为具有相似性。这种行为不仅是对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反抗，也是对现代社会高度规训化生活方式的“逃避”。通过选择低压力、低竞争的小城市生活，年轻人追求更加自由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对现代社会结构的反思与批判。这一现象为我们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选择和社会心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王晓毅. 作为一种生存状态的逃避——《逃避统治的艺术》的理论价值探析 [J]. 云南社会科学, 2019, (03): 89-95+187.
- [2] 段金生, 尹建东. 中国哪来的“赞米亚”? ——评《逃避统治的艺术》[J]. 历史评论, 2022, (05): 74-78.
- [3] SCOTT J C. 逃避统治的艺术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4] 徐婷婷. 消解“低欲望”对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奋斗精神影响的创新路径探索 [J]. 大学, 2024, (34): 119-123.